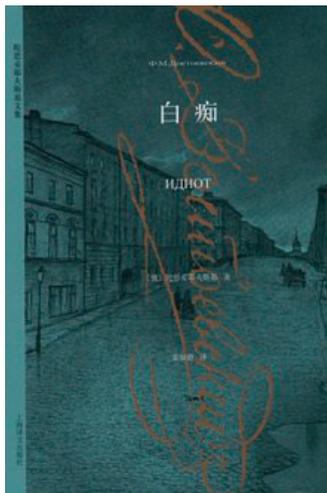


信仰与理性的对立

——《白痴》读后记

白廷全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荣如德

出版时间：2015-1

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茨威格展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转变的瞬间。那一刻，对于当时业已放弃人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看到了：

教堂的金顶

燃烧在旭日的红霞之间

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不觉中介入了俄罗斯化的、西方持续几百年的基督教信仰与西方哲学理性的斗争——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矛盾。但不同于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在思想与感情上有共同的地方，在俄罗斯，混合鞑靼基因的斯拉夫民族文化和东正教两方毫无共同的基础。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共有同一国家的贵族与平民的抱负，在人生的实际意义上完全不同，形成了民族精神和宗教的思想对抗，这种对抗随着西方文明思想的融入，形成了现实中信仰与理性的对立。

《白痴》这部小说，就是在这种重重社会思想矛盾的背景下创作的。通过对三种冲突的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中揭示出沙皇统治下俄罗斯民族信仰与理性对立起来的具体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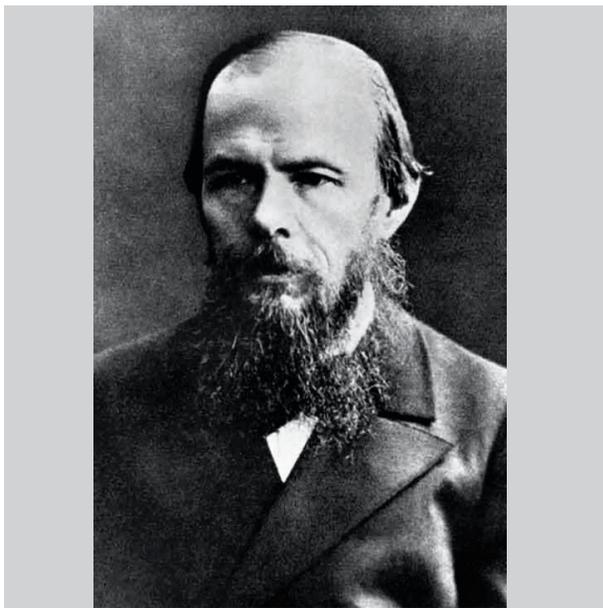
西方人与俄罗斯人的冲突

俄国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经济较快地发展起来。贵族阶层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生活方式

全面西化，信仰更倾向天主教化。而绝大多数农奴主对1861年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毫无思想准备，对变为地主阶级感到严重不适，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在俄罗斯传统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随着地主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下降，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主导地位日益突出，统治阶层内部开始出现严重的分裂。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俄罗斯保守派开始批评新兴的资产阶级，称这些被资产阶级思想异化的俄罗斯贵族为西方人，批评他们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精神上的污染，背叛了俄罗斯民族传统。实际上这是落后文化对先进文明的抵抗，对民族文化的强调不过是一种反理性的情绪。

道德美与形式美的冲突

在《白痴》中喊出“美能拯救世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笃信美的拯救作用，但他对美的理论基础与标准并没有根本的认识。布鲁姆曾说过，在具体的形式美面前，人们大都会忽略精神美的存在。女主人公娜斯塔霞是具备这种形式美的。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写来看，娜斯塔霞是明显带有鞑靼血统的俄罗斯人，有一种纯粹的、表面化的美，这种美虽然简单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另一位女主人公——阿格拉娅的美则更多的是内在的美、神秘的美，这种美伴随着惊人的感染力。对美的基础理论认知是启蒙时代的精神财



《白痴》一书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富，未受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影响的俄罗斯人是不知道这笔财富的。康德于美之中看到了道德之善的象征，但俄罗斯人是混合了鞑靼血缘的斯拉夫人，并没有这样的认知。其道德基础十分宽泛，对美的态度也就十分宽容和表面化。因此，对于娜斯塔霞与托茨基的不正常关系，在俄罗斯人的生活态度中是不存在受欺侮和蹂躏的感觉和印象的。主人公娜斯塔霞自己也毫不在意，并且很气愤上流社会用宗教道德标准衡量她的过去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这样的民族风情也是认同的。

反观阿格拉娅，出身上流社会，从小接受优良教育和天主教的熏陶。摩西和《摩西十诫》、《诗篇》和《福音书》的篇章常在脑海中回荡，来自宗教信仰的道德教导和引人入胜的内心生活赋予她坚实的道德基础，她的美是贞洁的、高贵的。在精神上更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求。

对于处在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对立状态的俄罗斯民族，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美真的很难办，不该承受道德的重负，所以，他对娜斯塔霞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但这种审美态度是令人惊讶的和野蛮粗俗的，这可能

是俄罗斯民族全面人性发展不良、不能体验美、完全没有参与正在进行的文明讨论的表现。按这种缺乏道德基础的审美原则发展，主人公们响应了钱钟书先生的那句话：“冤家”终是怨偶，方是悲剧之悲剧。

理想人与理念人的冲突

《圣经》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并成为他的创作基石。《白痴》这部小说最全面地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主张，被认定为他思想的巅峰。这本书充分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宗教思想，集中表现了他的宗教情怀与自我忏悔、自我惩罚和自我救赎的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自己本意就是塑造出一个极尽完美的人，换句话说——酷似基督的人。他同时说，这样完美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表现，恐怕只能是一个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一个比他作品中的任何一个主人公都要复杂得多的人：一个天才、极度神经质、癫痫病患者、嗜赌成性、生死线上走过一回，苦役、贫困和孤独经常陪伴。他独特的经历，世上难以再有作家有此体验。离奇的现实生活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清醒地意识到，他正生活在一个是非颠倒、善恶混淆、美丑不分的年代，没有比描绘一个美好的人物更难、也更紧迫的了。

主人公梅什金——一个理想人便是这样诞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熟悉人性，洞悉人性的弱点。他认为，人生的悲剧都是这些弱点造成的。为此，他创造了以伊波利特为首的虚无主义者形象——为理念而生、甚至可以为理念而死的人，是理念的化身或者代言人，是所谓的“思想人物”或者理念人。这类思想人物将人类社会进步历史完全解释为人类自私自利的行为的结果，从而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不信任、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类史成了一个抽空了道德基础和宗教信仰的历史，人类社会是一个要破除一切传统、弱肉强食的世界。只是在伊波利特的思想里，弱肉强食

的局面现在应该被颠倒过来，贫穷者应该成为更强有力的力量，因为贫穷这个理由可以成为毫不犹豫的杀人借口，成为赤裸裸的暴力掠夺的理论依据。

梅什金与伊波利特的冲突是《白痴》中的主要冲突，其紧张、密集的思想交锋，辩论的中心场面是这本书的高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伊波利特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这种理论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主张，忽略了人们行为的道德基础，将人类的社会活动完全奠定在自利的基础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一旦俄罗斯民族不能在信仰方面战胜理性的虚无主义，大规模的道德崩溃是必然的，其本质必定带来人性的崩溃，制度性屠杀将会成为社会现实。这个凶兆预言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实际上也正是这两种在俄罗斯本来没有共同基础的思想的异化并存，制造了20世纪最有组织的和最堂皇的屠杀，其余殃至今未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些问题出现归罪于天主教，归因于西方理性主义，显然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本性，也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情感与信仰的矛盾。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普希金、托尔斯泰一样，都是俄罗斯人生活的解释者乃至缔造者。但他没有注意到，无论天主教或东正教，源自基督教的真正的宗教信仰从未走入底层俄罗斯人，圣经知识在俄罗斯民间的流传少得可怜。基督在俄罗斯从未像在西方那样昂首阔步，君临天下。他也没有想到，俄罗斯的理性主义理论固然来自西方文明，但俄罗斯人不是崇尚书本的民族，其对西方理性主义概念的理解多属了解不全，甚至是曲解和误解。他更没有意识到，俄罗斯人是一个情感多于理性的民族，这使俄罗斯民族充满文化上的自负，拒绝向高雅文化表现出恭敬，也从来不反思传统，只是喜欢歌颂历史。一如俄罗斯的民间音乐，不管多痛苦难过，也会悲伤地歌唱。这样的民族文化是反理性、反进步的，从根本上忽视了欧洲精神的宝贵价值。

所以，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大声呼吁宗教信仰的回归，反复论证上帝的存在，其实际的

关注点就在于没有宗教信仰的荫护，道德将无家可归。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基因、血缘基因还是让他的努力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战胜了他的思想，很不情愿地预见俄罗斯的未来。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也许米兰·昆德拉的话更能感同身受：“人不能没有感情，但是当感情本身被视作价值、真理的标准，以及各种行为的正当理由时，它们就会变得令人恐惧。最高尚的民族情感随时可以为最恐怖的东西辩护，而心中充满抒情激情的人会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在一篇评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文章中，他曾评论说，自文艺复兴起，西欧人的情感已经被理性、怀疑、游戏的精神和事物的相对性所平衡，而俄国的历史恰恰缺乏文艺复兴的洗礼和启蒙运动的熏陶，遂不同于西方的文明。俄罗斯精神的奥秘就在于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不平衡，这种文化精神导致了俄国革命，也给东欧各国带来了灾难。

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将自己惨淡人生的体验转化为对俄罗斯全民族自赎之路的思考，他的作品确实已经上达于宗教的层面了。不可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面向未来的伟大作家。他提出了许多至今犹激动人心的、永恒的问题。

在《中国全息现实主义的诞生》中，胡河清写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从深厚的古典主义文学传统中逻辑地发展出来的。西方近代现实主义文学曾经在历史上取得长足的发展。上承古希腊哲人关于人类自我认识的文化指令，下得近代理性主义与自然科学最新成果之助，在对人性深度的洞察上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而现代主义文学又是这一博大精深的美学建构的历史延伸。”因此，如果缺乏文化背景方面的准备，又匮乏文化储存，再不破除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壁垒，要实现东西方文学思想上的沟通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十八世纪以来凸显的俄罗斯文学，可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①

（作者为1994级力学系博士后校友，现居新西兰，新西兰校友读书帮帮友）